

丛书主编/马敏 黄晓玫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文华人百余年的探索与奋斗、苦难与辉煌，向世人昭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石，文化是国家昌盛的深层本源。“国民之智慧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教育文化事业是开化人造就人的崇高伟业，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千秋基业。

不朽的文华

——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BUXIU DE WENHUA

CONG WENHUAGONGSHULIN DAO

WENHUATUSHUGUANXUE ZHUANKE XUEXIAO

◎ 周洪宇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二〇周年校庆丛书
丛书主编/马敏 黄晓玫



不朽的文华

——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BUXIU DE WENHUA

CONG WENHUAGONGSHULIN DAO

WENHUATUSHUGUANXUE ZHUANKE XUEXIAO

◎ 周洪宇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周洪宇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华中师范大学 110 周年校庆丛书)

ISBN 978-7-5622-6282-4

I. ①不… II. ①周… III. ①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史 IV. ①G649.
28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9032 号

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周洪宇 著

责任编辑:王 胜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 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536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37.5

版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3.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情势必然: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产生	(30)
第一节 晚清社会与西学东渐	(30)
第二节 传教士与西方公共图书馆观念的舶来	(33)
第三节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图书馆学的介绍	(36)
第四节 清末新政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勃兴	(41)
第二章 接踵而至: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科(1910—1930 年)	(44)
第一节 传教士的兴学活动与影响	(44)
第二节 文华共同体的缘起:文华书院	(47)
第三节 双重角色的文华公书林(1910—1920 年)	(52)
第四节 文华大学图书科(1920—1924 年)	(75)
第五节 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24—1930 年)	(115)
第三章 庚续弦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30—1949 年)	(136)
第一节 沈祖荣毕生的办学功绩诠释了“文华精神”	(136)

第二节	在文华图书科的初创期、植基期、扩展期宜“沈胡并称”	(141)
第三节	沈祖荣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与专业化的历史贡献	(158)
第四节	迁徙期(1938—1945年):沈祖荣带领文华图专艰难前进	(164)
第五节	矛盾再起:战后文华公书林的权属划分	(168)
第六节	重振期(1945—1949年):沈祖荣振兴文华图专的宏大梦想	(171)
第四章	革故鼎新:新中国成立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合并 (1949—1953年)	(182)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对私立学校采取的政策	(182)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文华图专的艰难处境:透过学生的视角看文华	(183)
第三节	文华图专进行的全面改革	(190)
第四节	划归公立:文华共同体的最终消失	(195)
第五章	朦胧色彩:受制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华共同体	(201)
第一节	设立主体	(201)
第二节	经费来源	(228)
第六章	走向变革:文华共同体内部职权体系	(256)
第一节	文华图专亦中亦西的行政管理体制	(256)
第二节	不断嬗变的学制轨迹	(279)
第七章	适者生存:美式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移植与改造	(287)
第一节	平民教育热潮下的课程设置	(287)
第二节	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碰撞下的教学方式	(318)

第八章 一枝独秀:近代图书馆学知识生产与“文华集团”图景	
.....	(334)
第一节 师资.....	(334)
第二节 学生.....	(349)
第九章 再添星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档案管理专业 ..	(392)
第一节 档案教育与档案理论研究的产生.....	(392)
第二节 文华图专档案管理专业的设立.....	(396)
第三节 文华图专对档案馆学建设的历史贡献.....	(409)
第十章 硕果满枝:谱写“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历史篇章	(418)
第一节 研究.....	(418)
第二节 出版.....	(438)
结 语	(459)
附 录	(468)
参考文献	(578)
后 记	(594)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图书馆是保存和传播人类文明、开启人类智慧的重要机构，是人类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官府、书院、私人等藏书机构源远流长，“老子为周室柱下史，即是国家已有官吏专司图书管理责任。汉高祖入咸阳，萧何首先收藏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已见图籍档案对治国的重要。因此历代政府，无不注重藏书，如汉之东观兰台，隋之嘉则殿，唐之宏文馆，宋之三馆一阁，元之秘书监，明之文渊阁，清之内廷四阁，皆为国家藏书所在”^①。中国历代所产生的图书，绝大部分集中于这些类似性质的藏书机构，包括官方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以至有学者谓：“我国的图书馆，到了汉代，已成为了一种事业。所谓事业，据易经坤：‘发于事业’疏：‘所谓事业，事成谓之业。’换句话说，有理想、有目标、有计划，不断经营的，都是一种事业。汉代的图书馆，已经循着这一方向运转，所以我们称之为图书馆事业。”^②到了清代，已形成完整成熟的官府藏书体系，包括清初以来建立起的宫廷藏书及各府、州、县的藏书机构。其中，宫廷

①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 [M]. 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21.

② 卢荷生.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 [M].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21.

藏书是中央一级的藏书，如南北七阁所藏《四库全书》，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官府藏书已发展到最完善、最丰富的阶段。

我国古代藏书机构的名称繁多，“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名，早期的藏书处都未冠名，把藏书处普遍称为某某藏书楼是到明清以后的事。常见的藏书楼除名以某某楼外，还多以某斋、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名之。更有一楼数名，乃至有名无楼者。书楼之名深得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之精妙，寥寥数字借以传达事主旨趣欲求、性情处境乃至藏书特色、数量规模等等”^①。古代的藏书机构或叫“府”、“宫”、“阁”、“观”，或叫“殿”、“院”、“堂”、“斋”、“楼”等，如西周的故府、秦朝的阿房宫、汉朝的天禄阁、东汉的东观、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朝的澹生堂、清朝的知不足斋、清朝的铁琴铜剑楼。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藏书楼塑造了中国博大精深的藏书文化，只是“可惜这些宝藏储之大内，不仅宇内读书人，绝对无法寓目，即是朝廷高官词臣，也不轻易得见。盖其意在保存而非利用”^②。

藏书楼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特别是遭遇晚清历史大变革时期，再遭受外敌入侵与军阀混战的破坏，无法逃脱没落的命运。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府藏书达到鼎盛的“四库七阁”藏书体系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创，“七阁”中“宫廷四阁”中的“文源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化为灰烬，“江南三阁”中的“文宗阁”和“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在1853年太平军攻破镇江和扬州时被付诸一炬，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亦曾流落市井颇有散佚，而藏有《四库全书》底本等大量珍贵藏书的“翰林院”则在1900年“北京围困”时被“八国联军”焚掠一空^③。叶德辉在记述太平天国后私家藏书的情况时说：“大江南北，遍地劫灰，吴中二三百年来藏书之精华，扫掉尽矣。幸有常熟瞿氏

① 任继愈. 中国藏书楼（第一卷）[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2.

②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 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21.

③ 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46.

铁琴铜剑楼保守其子遗，聊城杨氏海源阁收拾余烬，兰陵孙祠书籍归于吾县袁氏卧雪庐，江浙间所有善本秘抄，又陆续会于湖州陆氏皕宋楼，仁和丁氏善本室，长篇短策，犹可旗鼓中原。”甲午战争后，仅剩的几处负有盛名的私家藏书楼也在外国侵略者的覬覦之下在劫难逃，大量中国古代珍稀书籍流失海外。“日本在既得皕宋楼后，又覬覦瞿氏铁琴铜剑楼，遂引起学部之重视，议拟设置京师图书馆，并购置瞿氏藏书，以免流散，为他国所得。”^①

明清以前古代藏书机构的功能主要是保存图书资料，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故而影响范围有限。“在昔日各种藏书虽然不是对于一般人公开的，但对于受教育的人，即学者文人，是公开的。无论是什么人要经过科举的典试以人士者阶级不受任何限制，然而这些藏书馆阁只是往昔珍贵记载储藏之所，而不是传布有用的书籍于民间的枢纽。”^②这就是后世人们之所以把古代藏书机构统称为“藏书楼”的缘故。对于中国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在《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中是有明确认识的，他说：“藏书楼是静、贵族式保存、设在山林里、官府办的、注重学术著作文化结晶的机关。”可见藏书楼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保守性，它通常只服务极少数上层统治者和文人，不向公众开放。作为保存和传播人类文明，为广大社会民众服务的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李小缘认为公共图书馆是“动的、设在城市、民众办的、自动的、平民式的、贵考用的、注意精神快乐、文化的宣传机关”。

现代图书馆事业先驱袁同礼亦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一文中，揭示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的特征成因与弊端，“然私家藏书，愈秘不示人，愈不能永其传。当其聚也，穷毕生精力而为之，缩衣节食，引而弗替；迨其后也，非遭兵燹而散乱无遗，即为有力者捆载而去，一转瞬间，已散为云烟。加以书目简略，后世研究书史者，亦无所稽考，此亦清代藏书家之

① 张碧惠，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M]，台北：汉美图书公司，1991：123-124。

②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J]，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8（5）：42。

普遍现象也。盖载籍之厄，以中国为最甚。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此则今之务典藏者，有以力矫之矣”^①。

新式图书馆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随着普及公共教育思想而兴起，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美国是现代图书馆的先驱，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迅速发展，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公共图书馆运动，自然也包括中国。在“西学东渐”的特定历史情势下，西方的基督教徒、传教士和教会学校出于传教布道的需要，将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植入”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的土壤，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角色，在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早在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已在北京创办了南堂传教书库，接踵而来的有西堂传教书库、东堂传教书库、北堂传教书库。1842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此后相继有格致书院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等出现^②。它们的教会色彩均很浓厚，如徐家汇藏书楼的管理由教会总院负责，主管人员一般为耶稣会士，服务对象一般也为耶稣会士，其后才有所扩展。这些西方人士对于我国新式图书馆事业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在古代藏书楼没落的同时，为救亡图存，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维新改革仁人志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人了解到制度转换的重要性，开始了“在传统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时期，并由此导致了清末公共图书馆的创设和近代中国第一次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1904年，湖北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分别在武昌和长沙正式成立，它们是我国第一批官办的公共图书馆。1905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实行新政，将公共图书馆建设以法令的形式予以肯定。当时的省立新式图书馆一般具备了“公立”特征，却

①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96：426。

② 林明武，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与欧美图书馆关系[J]，中国电力教育，2008（11）。

不具备“公共”的特征，如有图书馆规定“不得携带僮仆幼孩”等。加之，图书馆普遍采取阅览券的收费方式，普通民众利用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据教育部本年调查统计，各省图书馆 23 所，通俗图书馆 237 所，巡回文库 30 个，公众阅览报所京师 9 个，各省公私阅报所 1 808 所。”^①而正在筹办和已经开办的各类图书馆，共有五种类型：公共图书馆有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市县级图书馆，公共藏书楼，阅览室，学校图书馆，专门图书馆。藏书机构的名称逐渐以“图书馆”取代了“藏书楼”。

在学校图书馆中，又尤以教会大学图书馆为主，这包括 1910 年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正式建立的图书馆“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 Boone University）。“文华公书林”的成立、发展乃至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后世影响，具有一般教会大学图书馆所没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广泛性、深远性。“文华公书林”的创办者为美国人韦棣华（英文名 Mary Elizabeth Wood，译为玛丽·伊丽莎白·伍德）。一般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创办者通常为基督教传教士，她却并非差会传教士，在创办“文华公书林”整个时段里，她只是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前身）的一名英语教师。创办图书馆的念头，一方面是其职业兴趣之使然，她来华前曾担任过美国巴达维亚市立里奇蒙德图书馆首任馆长；另一方面是出于启迪民智与当时文华书院客观上迫切需要一所正规图书馆的双重考虑，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Alfred Alonzo Gilman）的支持。

1923 年，韦棣华将 150 名中国知名人士和 65 名有影响力的在华美侨的两份联名请愿书，提交美国政府，为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用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奔走，并倡导将两国的图书馆通过行业组织联系起来，积极促成前美国图书馆协会馆长鲍士伟博士（Dr. Arthur Elmore Bostwick）访华，为处理庚款事务专门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参考其报告，决议资助中国文化事

^①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6．

业，包括图书馆学。文华公书林系在不足 20 平方公尺的“八角亭”藏书室基础上演变而来，之所以取名为“公书林”，本身寓有公之于众的意思。该馆将文华大学所藏图书馆期刊公开陈列，供人自由阅览，凡武汉地区机关、学校以及一般群众均可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所由外国私人经办的美国模式的图书馆^①。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公书林实行开架借书，创办巡回图书馆，在离公书林较远的学校和单位设点，送书上门，定期更换新书，使那些由于条件不便，无法到公书林来阅读的读者也能看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少见的。

尽管公书林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是韦棣华的图书馆事业梦想并非局限于此。一方面，到 1912 年，全国相继建立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共 18 所，据 1916 年《教育公报》统计：全国 21 个省市已拥有公私立图书馆 237 所。尔后中国恰好处于传统藏书机构向近代图书馆渐变的历史变革时期，不断崛起的民众意识与白话文运动给公共图书馆带来了无限生机，“民众图书馆运动因国内兴起了三种改革受到了强大的激荡。第一为民国六年所倡的文艺革命及复兴运动，其目的乃在推行白话为写作的工具。其次，民国八年学生运动继起，以唤醒民众了解新国家观念为标榜。再次，民国九年平民教育运动随之而起，要教授目不识丁的民众能读能写千字课本，并获得做公民的基本知识。有了这三种运动，于是白话体的通俗杂志和书籍出版至多，犹如雨后春笋，民国三年在邮政局正式登记的杂志仅 367 种，到了民国十年有 921 种，民国十四年有 1 323 种——十年之内增加约百分之二百六十”^②。显然，这是一个需要图书馆及其专门人才的时代。

另一方面，“文华大学图书馆规模甚小，馆藏贫乏，不敷教学需要，女士有鉴于此，除极力争取房舍，扩充馆藏外，并返美就读纽约普莱特学院（Pratt Institute）及波士顿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专攻图书馆学，

①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 [M]. 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26.

② 裘开明. 中国 [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8（5）：475.

以为实际的助力”。韦棣华考虑到要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想要建立一所图书馆学校，培养管理图书馆的专业人才。而建立图书馆学校，首先要培养师资，当时中国对图书馆管理员的理念还很陈旧落后，更谈不上有专门的图书馆学校。无怪乎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在1926年谈到，“图书馆学是一个新名词，恐怕只有二三年吧？在外国，也不过是近代的事。图书馆学这个名词，在外国书中，虽然发现于近百年前（1829年）；但是成为专门学，也不过最近10年的事。考图书馆事业的发轫，远在数千年前。我国向来有目录学、校雠学，也差不多有图书馆学的意思，不过内容却大不相同”^①。据资料记载，我国第一次在大学开设图书馆课程的是美国图书馆专家克乃文（Harry Clemens）。1913年，克乃文主持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时，曾在该校文科设图书馆课程^②。而通过独立的专业设置，通过学校教育系统地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则是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先开河。

1914年和1916年，韦棣华先后派文华大学两名毕业生沈祖荣和胡庆生赴美，入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专攻图书馆学。学成归国后，他们一面着手准备教学所用教材（基本上是移植和改造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如杜威的分类法），一面又组织宣传团分赴华中、华东、华北等地积极进行宣传，发起提倡美国式图书馆的新图书馆运动，主张建立公共图书馆。在对中国图书馆实际状况有了更加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得到中国教育界（如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帮助。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1920年成立文华大学图书科，附设在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文学院，文华大学图书科最初是从文华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招收兼修图书馆学课程的学生，学制两年。本科毕业生除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外，还另外发给图书馆学专科毕业证书。文华公书林作为当时颇具特色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是文华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也成了武汉民众的图书馆，而且成为文华大学图书科

① 杜定友. 图书馆学的内容与方法 [J]. 教育杂志, 1926, 18 (9、10).

② 张锦郎, 黄渊泉.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4: 9-10.

的办学依托和教学实习基地。

从某种程度上讲，韦棣华开启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大门，她引进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并促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欧美图书管理法多由日文传入我国。在一九一三年日本图书馆协会所编印的图书馆经营法被译成中文。当时有美国传教士当中的图书馆学专家教授中国学生以管理现代图书的方法。其中有几位后来留美攻图书馆学，返国后复以传授国人。第一所正式图书馆学校一九二〇年在武昌文华大学（后为华中大学）开办。韦棣华女士居是校之首，而以她的曾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两位学生为教授。”^①当然，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为本国图书馆学的产生做了一些先期准备工作，譬如，孙毓修综合日本和美国的情况于1909年发表了《图书馆》一文，谢荫昌于1910年翻译了日本的《图书馆教育》一书，等等。1917年前后，留学美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者沈祖荣、胡庆生、戴志骞、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等相继学成归国，他们迅即掀起了一场“新图书馆运动”，并直接促成了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从20世纪2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它锻炼了第一代学者而造就了第二代学者^②。图书馆学的薪火传承，足见“文华”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贡献延续至今。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倡导流行，各种国立的、公立的大学发展迅速，私人兴办的大学也蒸蒸日上，给教会学校的发展带来竞争之势。1922年，在上海举行基督教全国千人代表大会以后，教会提倡学校适当调整合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来加强其工作的影响，1924年文华大学合并其他诸校，改名为华中大学。根据校董会的预算，“图书馆杂志及图书馆的一切均由美国圣公会担负，而图书馆（即公书林）是和美国圣公会、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共用的”。

1927年正值北伐和国民大革命，“由于教会学校大多是美英的教会所举

①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J].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8（5）：480-481.

② 程焕文.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2）：35-42.

办，不能适应革命潮流，广东、湖南、武汉这些地区的教会学校纷纷停办”^①。反基督教运动在全国上下风起云涌，华中大学因此停办直至1929年复校。“在华中大学被关闭的这段时间里，其图书馆学专业仍在继续开办。这个专业的领导人希望华中大学重新开学后，图书馆学校仍是华中大学的一个部分。”^②然而，事不遂人愿，1928年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的胜利获取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加强了国家力量的重新整合，并随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文化教育、民族心理和宗教管理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国家整合工程，对由外国人建立并提供资金的教育机构施行更严密的监管。在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1929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了《部定私立学校规程》，要求所有教会学校必须进行注册。在重重压力之下，华中大学不得不向教育部注册立案。然而，“在学生训练、课程设置及图书馆学校领导与华中大学领导者的关系等等几个方面，华中大学与文华图书馆学校出现了许多争执”^③。韦棣华希望图书科能发展成一所独立的实力雄厚的专科学校，而不能受制于华中大学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却是华中大学所不能容忍的，于是1929年文华图书科董事会积极向南京政府教育部办理专科学校立案手续，同年8月批准立案，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校。1930年6月，华中大学教育委员会、评议会和教员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要求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要么成为华中大学的一部分，要么脱离华中大学成为一所独立的学院的“最后通牒”式的决议。多重因素的叠加，促使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决定“走自己的路”。1930年12月1日正式启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印章。

文华大学图书科以及后来的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① 韦卓民. 关于文华书院的变迁 [M] // 陈冠林, 杨胜红. 文华之光.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1: 13.

② [美] 柯约翰. 华中大学 [M]. 黄政辉,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50.

③ [美] 柯约翰. 华中大学 [M]. 黄政辉,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50.

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图书馆界的交流方面功不可没。除了前面所提 1925 年鲍士伟访华是由韦棣华一手促成，1926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图书馆协会参会代表为韦棣华、桂质柏、裘开明等 5 人。1927 年 9 月，韦棣华代表中国图书馆协会参加了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英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大会；1929 年 6 月 15 日—30 日，第一次国际图书馆与目录学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沈祖荣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参会。文华的许多优秀毕业生留学海外，一些毕业生在国外著名图书馆服务。文华也常常聘请外籍教师前来授课，许多国外的学校和机构都曾向文华捐赠和交换过书刊，文华的办学得到了世界各地的重视，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议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国外机构均曾援以办学资金。韦棣华逝世后，她的好友在国外募捐成立“韦棣华基金会”（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Foundation）。至今，韦棣华基金会还在亚洲与世界各地资助支持图书馆事业与人才培养，为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从最初文华书院的“八角亭”藏书室到文华大学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1910 年），从文华大学图书科（1920 年）到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24 年），再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30 年），最后至 1953 年并入武汉大学，前后跨越近半个世纪。在 20 世纪世界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历史潮流中，中国也先后进行了两次新图书馆运动，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开办最早、时间最长的图书馆学专门学校，其创办者韦棣华与发展者沈祖荣、胡庆生等人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融入世界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文华图专理所当然成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笔者选择“文华”作为研究主题实乃各种机缘叠合促成：

其一，个人求学经历、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是直接动因。华中师范大学的最早前身就是文华书院（尔后发展成为文华大学、华中大学），而文华公书林、文华大学图书科、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正是在文华母体内孕育而生的。笔者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育科

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习并获历史学学士（1982年）、教育学硕士（1988年）、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可谓一个地道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大人”。笔者1982年1月大学毕业以后，留校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任教，从事教育文化史研究，有机会接触到文华老人，了解到许多情况，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感触甚多，倍感珍惜。而且，“文华”又属于笔者专业教育文化史的研究范围，研究它有助于从一所学校的历史变迁看中国近现代教育文化史的流变、特征与规律，自然引起笔者的极大关注，故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留心研究，撰写相关论文，有所积累。钱穆曾谓：“贵于心知其意者之能微窥而知也。”如何将文华图专的研究从图书馆学科史转向教育文化史（包括西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研究，正是笔者沉浸“冥心渺索”与延伸“微窥功夫”的兴趣所在。

其二，笔者近年担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教科文卫工作，有机会经常对国内外大学办学尤其是其图书馆发展状况进行考察，接触各种历史和现实资料，也曾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共教育文化事业的议案和建议，希望能促成有关政策和法律出台。现实的工作与责任促使笔者格外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与发展。同时，笔者对口联系省档案馆、省图书馆，这些部门的同志也在研究中给予了热情协助，为笔者的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论语·八佾》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历史研究是要用史料说话的，现在大量的原始档案做依据，自然心中有底。

其三，今年10月恰逢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写作此书为母校献礼，是笔者的心愿。业师章开沅先生、师兄华中师范大学书记马敏教授、好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教授得知笔者的研究计划后经常问询，了解进展，也使笔者深感责任重大，义不容辞，刻不容缓。多重契机由萌而“动”，“倒逼”着笔者去研究。但毕竟现在公务缠身，无法像过去一样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写作，笔者只能利用工余休息时间研究，时作时辍。